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研究

阮云志, 戴玉珊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对不特定多数人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百年发展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了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的特点。与之相比,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对纪念对象蕴含的教育意义具有高度依赖性, 纪念活动对象具有典型性, 教育活动具有程序仪式性和教育情境对教育对象强大感染性的载体特点。通过分析大量活动实例发现,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和空间同样具有突出特点: 明确的历史任务指向性的时期性特点和活动时间与纪念对象相关时间对立统一的时间性特点; 专用和兼用纪念空间在营造纪念氛围和教育内容形式方面呈现出两者互补的空间性特点。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 特点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2.01.010

[中图分类号] D4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2)01-059-08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 它与对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共同构成了群体思想政治教育; 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相对于个体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1]。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纪念活动为活动载体对不特定多数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它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相对而言的。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纪念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为活动载体对不特定多数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纪念活动和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两者既有共同特点, 如两者都是以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教育对象都是不特定多数人; 同时两者在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方面又具有很多不同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特点

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相比,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具有教育目的依赖性、纪念对象典型性、活动举行仪式性、教育意指象征性和教育情境感染性等特点。

(一) 教育目的依赖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依赖性是指教育目的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纪念对象本

身, 因为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展开的前提是有纪念对象, 而不同的纪念能够实现的教育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纪念对象所能蕴含的教育意义。比较而言, 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通常可以根据教育目的来规划活动内容、形式、方式等, 而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则通常是依据纪念对象及其精神内涵确定教育目的, 如“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整合”^[2]等。重要人物纪念活动, 一方面带有缅怀之意, 另一方面则是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 使人民群众受到感染和激励。纪念江竹筠(江姐)、李大钊、杨靖宇等革命榜样, 弘扬革命精神, 可以对大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纪念已逝全国劳动模范代表等劳动榜样, 弘扬劳模精神, 可以对大众开展爱岗敬业和争先争优教育。纪念重要历史事件, 可以使大众铭记历史、鉴往知来: 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胜利等革命战争事件, 可以使大众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等重要历史事件, 可以使大众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经历的重要节点, 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成功经验和借鉴。重要节日纪念活动, 有利于提高大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凝聚全社会向善向上之力。纪念春节等民俗性节日, 能够展示中华民族文化, 增强教育对象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纪念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等节日, 具有开展政治、经济动员, 调动人民群众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前进之意。

[投稿日期] 2021-12-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19JZD045);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编号:2021B001)

[作者简介] 阮云志(1975-), 男, 安徽无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 活动对象典型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象典型性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选择的纪念对象是在同类型对象中最突出、最具典型性,最为大众所熟知并能引起其共情的纪念对象。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是以活动作为教育载体,但是对活动对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并没有特别的要求。而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象(是指内容性对象,即纪念对象,而非教育性对象,即教育对象)则一定要具有典型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审视,典型可以通过个别性反映一般性、通过特殊性反映普遍性;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审视,典型可以使不特定多数人唤起对同类人物、事件、精神等的共同回忆、合理想象和情感体验。为了让广大人民谨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3]的革命现状、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可以选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4]孙中山这一妇孺皆知的典型人物进行纪念。为了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激励广大人民为革命和建设奋勇前进,可以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长征进行纪念。为了让广大国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可以选取近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战争——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进行周年纪念。

(三) 活动举行仪式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举行仪式性,是指通过纪念活动开展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采用的是程式化仪式形式。程式化仪式生成方式通常有继承式、借鉴式和自创式等,一旦生成之后通常会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也就是说此后同类纪念活动的仪式将向着相同或相似的程式化方向发展。这种示范性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同类纪念仪式的程式一致化、稳定化,如国庆纪念阅兵仪式。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举行仪式性的直接目的是彰显和生发纪念活动的正式性、庄严性、感染性,间接目的是对不特定多数人产生纪念活动举办主体或者说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期望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通过非纪念活动开展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通常不用也不必采用程式化仪式方式,因此活动举行仪式性是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有别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作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念活动,与个体性、自发式纪念活动的不同也体现在其为“程式化仪式”^[5]活动。通常情况下,纪念对象越典型、

纪念意义越重大、参加纪念活动的行为主体级别越高、参加现场纪念活动以及大众传播、二级传播的受众范围越广,其仪式性越强、越正式。以2020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国家纪念活动中的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为例,它包括奏唱国歌、肃立默哀、军乐奏响同时敬献花篮、习近平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与整理花篮缎带、其他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依次献花等程式化活动。程式化活动不仅直接教育了现场活动参加者,而且通过大众传播和二级传播教育了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

(四) 教育意指象征性

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象通常是现实的从而可以现身说法或实体化再现所不同的是,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纪念对象通常都是历史的,难以现身说法或实体化再现,因此教育意指通常采用符号化、象征化的方式来表征,这就是教育意指象征性。其外在表现形式是象征化的纪念符号、纪念活动标识,这些纪念符号、纪念活动标识通常蕴含着深刻的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折射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价值观,蕴含中国共产党的情感态度、审美取向”^[6],广泛应用于活动现场的布置和活动周边的装饰。纪念符号和标识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设计和装饰,更象征着纪念活动的意旨,传达着活动的深刻内涵。在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纪念活动中,除设置党旗党徽等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公识性权威符号外,还会根据纪念对象和纪念意义设计独特精美的活动标识,使活动主题及其深刻含义一望可知,增强纪念活动的宣传力和影响力。建党百年的活动标识轮廓为数字100,数字为大红底色,1字上部是党徽,以党徽中的锤头柄末端为中心向四周散发白色光芒,两个0的内圈边缘是金色,内圈内分别是建党年份1921和庆祝年份2021,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党和人民走过的百年峥嵘岁月,标识的每一处设计都含有深刻寓意。纪念符号和活动标识的使用能够简明扼要地展现出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和内容,让人们在转瞬之间接收到教育信息,并通过广泛使用不断加深印象,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五) 教育情境感染性

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教育主体的语言文字向教育对象灌输教育内容不同,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情绪感染和情境

体验等方式将教育内容渗透到具体纪念仪式和情境中,激发教育对象对纪念对象的追忆怀念,使教育对象为情境所感染,受到精神洗礼,潜移默化地接受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此为教育情境感染性。作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念活动通过纪念环境布置、纪念仪式设置和纪念氛围烘托创设出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情境,以此调动教育对象的情绪,使其不自觉地受到情境感染而激发向上、向好的精神力量,从而达到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醒目的大会会标;帷幕中央十面红旗簇拥着中国共产党党徽和象征着共产党历经九十五载的“1921—2016”字样。与此相对,环绕观礼台悬挂着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标语横幅。大会开始后,全体起立高唱国歌、表彰党内先进的活动接连进行,使场内外受教育者受到激励,自觉向优秀先进学习。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使教育对象被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所感染,从而受到极大鼓舞,坚定奋斗决心^[7]。由此可见,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情境感染力是提升教育效果、达到教育目标的有效保障。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性特点

时间性特点是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施教育角度讲的。历史时期不同,特点不同;具体实施时间不同,特点有别。

(一) 历史时期性特点:历史任务指向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与非纪念活动相比,同一纪念对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教育价值,即纪念内容随着时期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依据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变化,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纪念什么对象、如何纪念,主要取决于为了什么(完成历史任务)纪念。也就是说,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纪念对象是已然、历史的,而指向通常是应然而未然的历史任务,此所谓历史任务指向性。以人物纪念为例,纪念人物的形象塑造“往往随时代的发展、政治诉求变化与社会变迁等因素而发生改变,经由主旨有别的纪念活动和文本以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言说”^[8]。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打碎旧世界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新世界的建设活动。与此相对应,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动员革命;建设时期则是动员建设。

1. 革命时期:动员革命

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目的之一是革命动员,但不同的革命时期,因革命的任务、对象不同,革命动员的指向有所侧重。

国民革命时期,纪念列宁诞辰、孙中山诞辰、十月革命、二七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五一劳动节等革命性质的纪念活动最为频繁,纪念旨趣主要在于动员各革命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4年2月李大钊曾在广州召开的悼念列宁并纪念二七工人运动大会上发表演讲,肯定二七大罢工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国民革命的先锋^[9]。192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为“五卅”周年纪念告民众》,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恢复并扩大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打倒直奉联合的反赤”^[10]运动。1927年“五一”劳动节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积极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全力援助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11]110}。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在于围绕动员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革命战争。1927年10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及其各派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附庸”^{[11]381},已不能反帝反军阀,工农贫民兵士应自己拿枪“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11]383}。工人应组织建立工农贫民政府、农民应获得乡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一般贫民兵士与工农联合,变为真正的革命军队^{[11]384-385}。

抗日战争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要为动员全民族投身抗日救国,因此抗战周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抗战相关纪念活动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7月1日,《解放》周刊在其《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上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2],动员民众参与抗战,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二九”纪念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已变得聪明而有力量,激励人民“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13]。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转变为动员人民大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1946年7

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向国内外人民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联手操纵我国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侵占我国领土领空领海等事实^[14],号召全国民众团结、勇敢起来,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要为号召劳动人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动员全国人民完成三大改造。1952年8月《中央关于第三届国庆节纪念办法的规定》强调要利用本次国庆节宣传活动向全国人民说明国家现状、动员全国人民“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5]。

2. 建设时期:动员建设

建设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当然不同的建设时期侧重点也会因建设任务等方面的不同而具有时代特点。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纪念活动大多围绕动员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凝聚发展共识展开。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大型纪念活动中党的领导人都会发表重要讲话,动员和鼓励全国人民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纪念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鼓励人民群众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16]等,动员全国人民献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这一时期,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标转变为动员全国人民参与改革开放,调动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激发发展活力。1979年9月,在建国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叶剑英明确指出,当前国家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7],鼓励全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

十八大以来,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适时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而进行最大限度的广泛社会动员。2013年5月4日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重要讲话,指出本次座谈会地点选在航天城就是要通过载人航天精神激励“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18]。

(二) 实施时间性特点:点一点对立统一性

若将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时间和纪念对象(内容性对象)有关时间(如人物诞辰或离世时间、事件发生时间)都粗略地当作一个时间点并深入研究这两个时间点的关系的话,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出点一点对立统一性特点,即这两个时间点既可是相互统一(一致)的,又可是相互对立(不一致)的。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这种对立统一是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一是因为前者中的内容性对象很多时候并不是确定性地、历史地发生(如未来共产主义),二是因为前者中的内容性对象确定性地、历史地发生,也没有必要关注和强调其发生时间与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时间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非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时间并不受其发生时间的影响,可以在任何时间实施。

1. 点一点统一性

点一点统一性,是指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对象有关时间之间基本统一(一致)。要说明的是,人物诞辰或逝世时间是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但事件发生时间可能是个时间点,也可能是个时间段,但为了便于纪念通常将其中某个时间点作为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代表。

其一,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人物诞辰时间相统一。通常情况下,纪念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间宜与其诞生或逝世时间相统一,一是因为其诞辰或逝世日可考,二是因为历史真实,三是因为这些人物通常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具有巨大影响力。此类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个性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官方纪念诞辰日、民间纪念逝世日。官方通常从感谢某个具有历史贡献和历史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角度去纪念其诞辰,如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民间则通常从痛失某个值得敬仰、爱戴和怀念的重要历史人物离开世界的角度去纪念其逝世,如普通民众于每年的9月9日自发去毛泽东纪念堂通过瞻仰遗容的方式纪念其逝世。二是逢十大规模纪念,每年小规模纪念。2014年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举行大型纪念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邓小平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9],值得全部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追思

和学习。2015年邓小平诞辰111周年时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小规模纪念活动。其出生地四川广安市在当地邓小平铜像广场举行了庄严的献花仪式,广安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等人参加献花仪式并发表讲话。

其二,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事件发生时间相统一。重大历史事件,在其真实发生时间开展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使得这一特定时间从普通日期变为一种具有特定化历史意义甚至类型化历史意义的“象征时间”,从而一提到这一时间就能够使人自然联想到特定纪念对象甚至同类对象及其历史意义,不自觉地起到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建党以来,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多,这就需要从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进行类型化纪念。代表外敌入侵、民族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可以选择“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代表武装反抗压迫、民主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可以选择八一南昌起义(同时也是建军纪念性事件);代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可以选择新中国成立。以“九一八”事变纪念为例,选择在9月18日这一天开展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使得这一天变为一种“象征时间”(这一“象征时间”通常与象征性的纪念活动之一——拉响不特定多数人均可听见、像在敬英烈、寄哀思、诉耻辱的防空警报相结合),使得不特定广大民众只要提到这一时间点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九一八”事变,联想到日军侵华的残暴罪行,联想到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种种屈辱历史,体悟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朴素道理,同时也会联想到当时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从而激起今天的莘莘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迈激情,激起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奋斗的爱国热情。2020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当天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有感而发,纷纷表示“一定要居安思危,要时刻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团结起来,建设强大的国家”,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志”^[20]。

2. 点一点对立性

点一点对立性,是指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对象有关时间(人物诞辰或离世时间、事件发生时间)之间基本相对立。

其一,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人物有关时间相对立。此类纪念对象性人物,通常有三类——传说人物或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非典型性英雄人物和普通民众以及极个别情况下的正面典型人物。此

类纪念,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人物有关时间之所以相对立,一是因为传说人物、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或真实性历史人物诞辰日不确定(如炎帝)、有争议(如黄帝)或因年代久远而无力考证,因公认而不必考证(如屈原);二是因为大量的同类型纪念人物有关时间相对立,又需要合并纪念,如无数的革命先烈;三是因为其他积极因素影响,使纪念活动时间设在纪念对象诞辰或离世时间之外的某个时间更具有纪念意义,更具号召力和影响力,如雷锋纪念日,既不是雷锋的出生日也不是牺牲日,而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题词被首都各大报纸公开发表日。

此类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如下:一是目的指向鲜明化。传说人物或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纪念具有同根同源、民族认同的目的指向。黄帝陵祭典目的在于通过祭祀公认的中华民族始祖来确证海内外华人作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民族身份认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目的在于纪念死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二是纪念日期特定化。一种是放在清明节之类的节日,如黄帝陵公祭大典;另一种是单设纪念日,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每年9月3日,中国烈士纪念日是每年9月30日。三是纪念对象类型化。非典型性英雄人物和普通民众纪念,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认知等成本,通常采取类型化纪念方式进行。常见类型主要有自然灾害类(如地震)、社会灾难类(如屠杀)等。三是官民纪念差异化。在纪念日期上,黄帝公祭日通常是清明节,而民祭日通常是重阳节;在纪念仪式上,官方公祭和民间祭祀也存在较大不同。

其二,主体纪念活动时间与纪念事件有关时间相对立。此类相对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确定纪念活动日期时无法确定纪念事件发生的确切日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党纪念。由于当时各种因素党的一大参会人员无法确定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因此建党的确切时间也无从查证。毛泽东曾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将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而后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纪念建党二十周年的指示中正式将“七一”作为党的诞辰进行纪念。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经考证确定一大的真实召开日期应为1921年7月23日。虽然建党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真实历史日期,但由于“七一”建党日已成为一个“象征时间”铭刻在人们心中,因此后来开展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也仍在7月1日或以该日为中心开展。二是多项需合并纪念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相对立。1958年3月5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郑重宣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而后广西区人民委员会将3月15日确定为自治区成立纪念日。随后考虑到纪念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1949年12月11日发生的广西全境解放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现实需要,自1978年起自治区的成立纪念日由3月15日变更为12月11日,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也改为12月11日开展。

三、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性特点

空间性特点是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施教育和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空间场域角度以及专用纪念空间和兼用纪念空间的职能角度来讲的,因此可总结为空间场域性特点和空间职能性特点。

(一) 空间场域性特点:在场—非在场差异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场域是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达至不特定多数教育对象的空间和该空间中影响教育效果的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环境。空间场域,根据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是否在场,可以分为在场式和非在场式空间场域;根据存在形式,可以分为物理空间场域和虚拟空间场域。空间场域不同,具体特点有别。

1. 在场式特点:共场共情性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共场(同时在同一空间场域),通常会引起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共情。这种共场共情是前述教育情境感染性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和依据。非纪念式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即使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共场,通常也不会仅因共场而产生共情,其共情的生成往往需要借助于主体的言说内容、言说方式等其他方式。在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中,当官方组织或个人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教育主体,连同教育对象都在场时,教育对象会因具有仰视性在场感而更加乐意接受主体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常见的这类纪念活动有中共中央、中央部门等官方组织的纪念大会、文艺晚会、悼念仪式等。有学者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表达”^[21]。在2019年国庆70周年庆祝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2]。掌声不仅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也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活动中进行的号召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乐受之意。

当民间组织或个人作为教育主体,连同教育对象都在场时,教育对象会因平视性在场感而更加乐意接受教育主体在纪念活动中进行的感染性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类型常见的纪念活动有公开举办纪念仪式、演讲宣讲活动、文艺汇演等。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四川安岳的民间艺术和收藏家协会的演员们为当地群众演绎了一出《鬼子进村》的历史故事。当地群众李小林在观看演出后心情十分激动,称“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我们不仅体会到了革命先驱的伟大付出,更懂得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值得珍惜”^[23]。

2. 非在场式特点:对象主动性

非在场式大体可以分为教育主体非在场、教育对象非在场、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均非在场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在实际活动中具有不同的特点。教育主体非在场时,教育对象呈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纪念活动中的行为约束和思想导向由教育主体的外在约束和人为灌输转变为教育对象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理解,凸显出纪念活动的自我教育功能。张贴纪念标语、悬挂横幅、开放纪念馆、播出相关剧目、参加文艺汇演等方式在纪念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和功能发挥,就体现出在教育主体非在场时教育对象自身对参与纪念活动和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育对象非在场情况下,通常会重点采取媒体宣传、直播、转播纪念活动的形式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信息更便于传播、教育范围更加广泛。2015年由中央电视台进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大会的直播活动。据统计,当天全国共有4.89亿观众同时观看直播,规模空前,观众反响也十分热烈。此次直播更是引起美国CNN、英国BBC、俄罗斯RT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8家电视机构的高度关注并进行全程或部分转播,引起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和全球各国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共鸣。BBC评价此次直播“向国内国外展示了习近平主席振兴中国的决心和中国的军事实力”^[2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均非在场式的纪念活动相继出现。通过教育主体预留的教育信息使教育对象不限时间空间、不限次数地接受教育,且教育主体只需更新和添加教育信息即可,对于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更具有便利性,常见的形式有参观网络纪念馆、线上展览等。

(二) 空间职能性特点:专用—兼用互补性

从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角度来看,

专为纪念活动而构建的空间可被称为专用纪念空间,具有包括纪念在内的多职能空间为兼用纪念空间,这两类空间本身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影响着教育主体对纪念空间的选择和教育效果的发挥,并且两者在实际运用中往往相辅相成,实现优势互补。

1. 纪念氛围营造互补性

在通过纪念活动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时,纪念氛围的营造是影响教育对象情感变化和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专用纪念空间还是兼用纪念空间,在开展纪念活动时都能够营造出浓厚的纪念氛围,而营造纪念氛围的主要和次要来源则有所不同。专用纪念空间是纪念历史事件(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历史人物(如毛主席纪念堂、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专用空间,在构建时就带有人们对纪念对象的深厚情感,空间布置都是人们的情感寄托。可以说,专用纪念空间本身就是营造纪念氛围的主要来源,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则是氛围营造的次要来源。兼用纪念空间(如天安门广场)则由于其多职能性,并非无时无刻具有浓厚的纪念氛围,而且其空间本身并不具有纪念特性。因此,在选择兼用纪念空间召开纪念活动时,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成为营造纪念氛围的主要来源,纪念空间成为次要来源。通过纪念活动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时,将专用纪念空间和兼用纪念空间相结合,既能够充分利用专用纪念空间的优势营造纪念氛围,也能够激发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对纪念对象的深厚情感。

2. 教育内容形式互补性

在教育内容方面,专用纪念空间和兼用纪念空间存在很大不同,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专用纪念空间本身蕴含着与纪念对象相关的大量历史内容,历史事件专用纪念空间全面展示事件发展历程及其时代背景,历史人物专用纪念空间通常能够完整展示人物的人生历程及其光辉事迹。因此相对于兼用纪念空间来说,专用纪念空间的教育内容系统性和完整性更强。在教育形式方面,专用纪念空间和兼用纪念空间的设施设备等设立和存在状况也有所不同。两类空间的建构初衷不同,因此专用纪念空间的设立和存在通常是常设性、永久性的。虽然其建构成本较高,但当教育对象身处其中时通常更能感知、理解和体会纪念对象当时的境况和思想行为,可“通过场域自身特点及其布置、陈设、装饰等形塑人民对历史的重要记忆”^[25]。兼用纪念空间的设立和存在则通常是临设性、临时性的,因此相比专

用纪念空间来说,其建构成本较低,灵活性和机动性更强,空间内的设施设备等都可按照不同教育目标和需求灵活变化。基于以上两点,专用纪念空间和兼用纪念空间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两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且能够优势互补,教育主体和对象通常可以根据教育或接受教育的需要和成本等因素,交替或互补使用专用和兼用纪念空间。

纪念对象是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纪念活动是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且一成不变。要充分实现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就必须把握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在充分融合纪念资源与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引导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奋斗意志”和“恒心韧劲”^[26],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拼搏奋斗。

参考文献

- [1] 阮云志.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提出与研究论纲[J]. 求实, 2009, (04): 68-70.
- [2] 陈金龙.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72.
- [3] 黄彦. 孙文选集(下)[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1): 643.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56.
- [5] 陈红军. 新中国纪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27.
- [6] 董小彪. 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 2.
- [7] 徐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 人民日报, 2016-07-02(001).
- [8] 牛保秀. 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1(01): 83-93.
- [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12.
- [10]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66.
- [11]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8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92.

-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35-236.
- [15]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04.
- [16]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44.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2.
- [18]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002).
- [19]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002).
- [20]刘洪超.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珍爱和平 维护和平[N].人民日报,2020-09-19(004).
- [21]贺东航.“纪念讲话”的话语谱系、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推进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3):4-8.
- [22]新华社.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N].人民日报,2019-10-02(001).
- [23]贺勇.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N].人民日报,2015-09-01(006).
- [24]于慧丽.“9·3”大阅兵,央视向世界报告[J].传媒,2015(18):32.
- [25]梁少春.空间与象征:中国共产党国庆纪念研究的新维度[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04):4-10.
- [26]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6-30(002).

[责任编辑 李瑞萍]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ass by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RUAN Yunzhi, DAI Yusha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21, China)

Abstract: Commemo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ass whose quantity is unspecific. In her one-hundred-year history, the compared with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ass by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non-commemorative ones. Comparatively,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he former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emorable objects. The more typical the objects are, the more procedural and infectious the activities are. By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activity examp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ime and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ass also hav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It reflects the opposite unity of the feature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special moment of the commemorated objects. Also, the dedicated memorial space and dual-use memorial space show the complementary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creating a memorial atmosphere and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form.

Key Word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ass; characteristics